

情感表达与翻译再现： 语用学视角下《东方快车谋杀案》的 情感翻译策略

崔雨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武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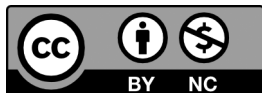
摘要 | 本文从语用学角度分析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三个中文译本中的情感表达。情感表达即通过语言传达和体现作者和角色的情绪、感受以及心理状态的方式，在文学作品中不仅塑造了角色的性格和故事情节，也为读者提供了深入了解作品内涵的窗口。然而，学界尚缺乏关于该译文情感表达的翻译策略研究。本文从语用学相关理论如语境和礼貌理论出发，分析宋兆霖和榕榕（1979）、陈尧光（2006）、郑桥（2020）的译本，通过分析人物情感表达，揭示不同译者如何通过词汇选择增强情感效果。研究结果显示，宋兆霖和榕榕的译本在细节处理上更为精准和丰富，语境处理更加细腻，与其翻译经历与习惯有关。本文强调了译者处理情感细节的敏感性和语用学在文学翻译中的重要性，对提高文学作品的翻译质量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 《东方快车谋杀案》；语用学；情感表达；情感增强；翻译策略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一、引言

英国著名女侦探小说家、剧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在推理文学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其代表作之一《东方快车谋杀案》（*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自1934年首次出版

以来，于1979年后被译为多个中文版本。该作品不仅在文学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还被多次改编为影视作品，显示出其独特魅力及在全球文化交流中的深远影响（郭旋，2018：91）。

根据豆瓣读书网站和国内主要电商平台的数据^[1]，当前最受欢迎的译本分别来自陈尧光

[1] 本研究在分析《东方快车谋杀案》中文译本的流行程度时，采用了量化数据搜集方法。笔者于2024年4月2日在豆瓣读书（<https://book.douban.com>）以及中国两大主要电商平台淘宝（<https://ai.taobao.com>）和京东（<https://www.jd.com>）进行了数据搜集。通过对《东方快车谋杀案》各译本的销售量和评论数量进行分析，确定了郑桥和陈尧光版本的受欢迎程度。例如，在豆瓣读书中，陈尧光2006年译本评论人数达到13万，郑桥相关译本评论人数超过5万；郑桥译本在至少40家店铺有售，初步统计的总销量超过一万本，评论数量亦超过一万条，据此判定郑桥译本和陈尧光译本为当前市场上受欢迎的版本。

(2006)和郑桥(2013, 2019, 2020)。考虑到研究译本需要具有一定的时间跨度,最终笔者选取了距今时间最近的2020年郑桥译本、距今时间较为久远的1979年宋兆霖和镕榕译本,以及豆瓣评论数最多的2006年陈尧光译本;从译本的作者和出版社角度出发,宋兆霖生前是浙江大学教授,是翻译文学领域的重要人物,译著近50种;陈尧光生前曾任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研究员,充分了解中外文史,他在知网上发表多篇英美文化相关文章,也曾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在翻译界成果卓绝;郑桥相关简介较少,但其译作发表的出版社新星出版社成立于1989年,如今是一家可以对国内和国外同时出版发行的综合性出版实体,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三版译本的译者和出版社名气较大,因此其译本质量有所保证,具有研究价值。综上所述,笔者选取了宋兆霖和镕榕(1979)、陈尧光(2006)、郑桥(2020)三版译本进行研究分析。

二、语用学与语言情感

“语用学”(pragmatics)最早由美国哲学家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William Morris)在其著作《符号理论基础》(1938)中提出。“莫里斯把符号学分为符号关系学、语义学以及语用学。语用学研究符号与符号解释者之间的关系”(何自然、冉永平,2006:5)。语用即语言运用,是指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下,交际双方进行的言语交际活动,这些活动经常会发生变化,如同一句话在不同的场景、语气、表达方式下所表达的意思也不同。这种语言环境的存在,即语境,是语用研究中的核心概念之一;语用学是用来研究意义的学科,而这些意义都与语境有关(胡壮麟,2019:153)。礼貌则是在语境之下产生的一种语用现象,其关注的是说话人的言语在语境中对听话人产生了何种影响(何自然、冉永平,2006:115),因此,礼貌可以用于研究人际交往过程中的语言运用,此类研究即形成了礼貌理论,成为语用原则之一。

“莱可夫(Lakoff, 1973)、布朗和列文森(Brown and Levinson, 1987)以及利奇(Leech, 1983)等人提出了礼貌理论”(何自然、冉永平,2006:111)。语用原则有助于会话顺利进行,然而在实际的交际过程中,人们并不总是遵守这些原则,这

时就需要结合语境从话语之中找出言外之意。对于文学作品,尤其是《东方快车谋杀案》这种对话推动情节走向的侦探小说而言,语境和礼貌理论为分析其中对话的言外之意和人物形象塑造提供了有力方向。通过结合整本书的语境,我们可以理解人物角色的言行举止;根据礼貌理论,我们可以找出人物角色的反常微表情或动作,从而厘清推理逻辑中的蛛丝马迹。

在分析小说的众多分析维度之中,情感表达对于推理小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人物的言语、行为占全篇的主要篇幅,一言一行都蕴含着角色本身的情感以及作者赋予该角色的情感,这些情感对于人物角色的塑造以及情节推理逻辑都十分关键,或许一个微表情就是破案的关键。纵观语用学领域下的情感表达研究,情感表达多指“语言使用、语篇或文本中体现出的情感,或言语和文本的情感层面/维度”(张宇,2022:72),其界定可以分为两类:其一,言语行为及其伴随的动作、神态(黄立鹤,2019:44);其二,说话人观察并推理他人的情感状态(张永伟、顾曰国,2018:52)。对应小说之中,即情感表达不仅包括直接从角色的对话或内心独白中透露的情感,也涵盖了作者通过叙述方式、语言选择和情境设置赋予文本的情感意义。本文既考虑了如波洛等角色的直接情感表达(如他们的言语、思考和行为),也考虑了原作者阿加莎·克里斯蒂赋予的情感。

在翻译研究中,语用学的应用对于分析译文的蕴涵意义、与语境的适配度等具有重要作用。其中,语境帮助理解译者对于人物角色情感的处理是否准确,礼貌原则帮助捕捉人物角色更加细微的表情、动作中所蕴含的情感,从而解释译者如何通过不同的策略在目标语言中再现或增强原文的情感色彩。在翻译研究中,运用语用学分析可以揭示译者如何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处理情感表达,增强译文的文化适应性。若译者在翻译中巧妙地融入了译入语读者的文化预期和语境理解,便可以增强原文的情感色彩和文化共鸣。在《东方快车谋杀案》的案例中,译者通过对原文情感层面的准确捕捉和表达,强化了文本的情感深度和读者的共鸣,这是本研究的核心焦点。

三、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了宋兆霖和镕榕（1979）、陈尧光（2006）、郑桥（2020）的中文译本，选取其中蕴含丰富情感的部分，如人物角色的动作、神态、语言、语气描写，整理成Excel表格，8纵列依次为原文+三个译本和各自的备注分析，总共105条例子，形成本文的研究语料库。此处的分析主要关注语言用词的细微差别，以及这些元素如何影响整体情感的传达。

意义的理解需要依托语境，而对于推理小说这类文学作品而言，角色的交际活动对于情节发展和人物刻画都十分重要，此时就涉及礼貌这种语言现象。而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则是一种文化交际活动，译者不仅要准确理解和再现原文的情感，还需考虑读者的感受，从而结合目标语言文化得到译文。所以，将语用学用于分析之中，可得出译者如何处理译文以增强其文化适应性。因此，本方案例分析依托语用学相关理论，分为语境、礼貌理论、文化适应三部分。本研究解释了在翻译过程中观察到的现象，选取了多个不同人物的例子进行分析，意图向读者尽可能全面地展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使用特定词汇或者翻译策略对情感表达词汇进行处理。

四、案例分析

本文采用了语用学相关理论，对宋兆霖和镕榕（1979）、陈尧光（2006）、郑桥（2020）三版中文译本中的情感表达相关译文进行分析，探索其中情感增强相关的翻译技巧与策略。本部分涵盖了一系列角色，从主角波洛（Hercule Poirot），到配角如雷切特先生（Samuel Edward Ratchett/Cassetti）、德贝汉小姐（Mary Debenham）、哈巴特太太（Caroline Martha Hubbard）及德拉戈米罗夫公主（Natalia Dragomiroff），以期获得全面而客观的研究成果。根据语用学理论框架，本部分将案例分为三部分：与语境相关、与礼貌原则相关、与文化适应相关的情感表达翻译分析。

（一）语境与情感表达

在翻译过程中，语境的重要性不容忽视。词汇的意义和选取不仅依赖于语境，而且由语境中的各种因素所塑造。例如，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

结合医生与波洛对话的上下文语境，可以得出波洛分析案情过程中的情绪变化，便于译者选取合适的词汇表达他的情感；结合全文的语境，得到雷切特先生的负面形象，以便译者更好地刻画人物神情。该部分将深入探讨译者如何利用语境来增强原文中的情感表达，并且强调了语境在理解和传达词义方面的核心作用。

例1：

原文：“Magnificent,” said the little doctor with enthusiasm.

The other's eyes **twinkled**.

“You think so? I am glad. It sounded to me a little like the nonsense.” (Agatha, 2015: 62)

宋译：“动人极了。”矮小的大夫热情地说。

对方的眼睛中**闪烁着喜悦的光芒**。

“你是这样想的？我很高兴。可我听起来，这有点像胡说八道。”（宋兆霖、镕榕，1979：63）

陈译：“妙极了，”这位矮个儿医生兴奋地说。

波洛**眨了一下眼睛**：

“你真的这样认为吗？我十分高兴。可是这个假设在我听来有点无稽。”（陈尧光，2006：58）

郑译：“真了不起。”小个子医生热诚地说。

对方的**眼睛里闪着光**。

“你是这么认为的？我很高兴。可我听着像胡说。”（郑桥，2020：53）

此处对话出现的场景是波洛侦探和医生前来检查尸体，由于发现死者身上的刀伤有来自左手的也有来自右手的，所以波洛分析是两个凶手前后来行凶，对话由此产生。尽管波洛对这个推理存疑，但得到了医生的夸赞，从而做出了“twinkled”的反应，该词描绘了波洛愉悦却半信半疑的情绪。

“twinkle”一词原义之一为表达某人的愉快、幽默（Collins Dictionary, 2018: 1626），用以描述波洛的愉快心情，从下一句话可知波洛并不认同自己的分析，所以此处语境为波洛知道自己的分析并不成立，但是由于医生支持他的观点而十分高兴。根据Verschueren（1999：59–61）在语用学领域的研究，语言的选择在交际语境中完成，所以情感的表达和理解与特定的语境紧密相关。宋兆霖和镕榕的翻译用“眼睛中闪烁着喜悦的光芒”生动表达了波洛的情感状态，增强了情感表达。他们的翻译在捕

捉和增强原文的情感和语境方面表现突出，更准确地传达了波洛的心理状态和情感反应，使得读者能够更直观地、更深刻地体会到波洛的愉悦。这种情感增强的翻译策略，充分体现了语用学理论关注读者体验的特点。相比之下，陈尧光和郑桥的版本虽然传达了积极情感，但在突出喜悦感方面略为逊色，不利于读者捕捉波洛在分析案情过程中的情感变化，使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波洛形象缺少立体性。

例2:

原文: The detective was conscious of those **strange shrewd** eyes summing him up before the other spoke again. (Agatha, 2015: 29)

宋译: 在那人再次讲话之前，侦探就意识到那双在估量着他的**阴冷、厉害**的眼睛。(宋兆霖、铨榕, 1979: 28)

陈译: 这位侦探意识到那对**狡黠**的眼睛正在打量他。接着对方又说: (陈尧光, 2006: 27)

郑译: 在那人再次开口讲话之前，侦探早已留意到对方那双**古怪而精明**的眼睛正在打量着他。(郑桥, 2020: 25)

此处上文是雷切特先生坐到波洛对面并道出了波洛的身份，下文是他想要请波洛保护他并支付酬劳。这句话是对雷切特先生的眼神描写，这一描写不仅揭示了雷切特的性格，也暗示了他的内心状态。“strange”意思是不寻常的、意想不到的、使人紧张或害怕的，“shrewd”意思是可以迅速分析局势并为自己所用(Collins Dictionary, 2018: 1396, 1488)，前者偏贬义，后者可褒可贬。这种复杂的情感表达更加需要在翻译中得到恰当的处理。根据Hatim和Mason(1997: 50)对语用学在翻译中的应用研究，“原语和目的语之间微妙的差距，取决于译者对原文功能的解释，包括对语境、语言结构、用词的综合理解”，这表明了翻译过程中，对原文的深入理解并不能仅限于表面文字，而是需要深入挖掘原文所传达的情感和语境。所以，结合整本书来看，雷切特先生其实是一个反面人物，内心十分阴暗，是一个恶行累累的罪犯。所以此处对于这两个形容词的翻译应该突出贬义色彩。宋兆霖和铨榕的译文“阴冷、厉害的眼睛”在情感增强的程度上做得较好，其中“阴冷”意为“阴沉而冷酷”(现代汉语词典, 2016: 1559)，更加突出了雷切特的阴暗和计谋深沉的特质。结合

胡壮麟(2019: 153)关于语境在理解意义过程中的重要性，该翻译在处理原文语境和情感方面表现得较为突出，更好地传达了雷切特这一角色的复杂性和阴暗面，增强了读者对人物性格和心理状态的理解。相比之下，陈尧光的“狡黠的眼睛”中“狡黠”意思为“狡诈”即“狡猾奸诈”(现代汉语词典, 2016: 654)；郑桥的“古怪而精明的眼睛”中“精明”意思为“精细明察；机警聪明”(现代汉语词典, 2016: 689)，尽管传达了一定程度的狡猾和机敏，但在强调雷切特的阴暗和狡诈特征方面稍逊一筹，不利于加深读者对雷切特先生的负面印象，从而影响读者理解这位负面人物的言行。

(二) 礼貌理论与情感表达

礼貌理论对于推理小说中人物形象的构建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此类小说中，人物的动作、表情和神态都有可能成为推进情节的关键线索。因此，对于推理小说中的情感表达，其翻译需要达到更高的准确性和精确度。在文中，角色的情绪对于其形象刻画起重要作用。这部分的分析将集中于如何利用礼貌理论来理解原文中的人物情感，进而生成本更准确和细腻的翻译文本。

例3:

原文: She made a little **abrupt** gesture, as though she were waving the idea of danger aside as something completely unimportant. (Agatha, 2015: 12)

宋译: 她做了一个**有点儿粗暴**的手势，仿佛她是在把有危险这种想法，当作无关紧要的东西，挥到一旁。(宋兆霖、铨榕, 1979: 10-11)

陈译: 她**不耐烦地**摆了摆手，仿佛对有无危险一事并不在意。(陈尧光, 2006: 10)

郑译: 她做了个**不太淑女**的手势，仿佛想把危险事故丢到一边，把那当作无关紧要的事。(郑桥, 2020: 10)

在此场景中，火灾导致列车停驶，尽管列车员一再向乘客保证安全，但德贝汉小姐依然表现出不耐烦的态度，并以例3中的手势来表示自己对危险的毫不在意和对耽误时间的烦躁。她的手势不仅是对当时情境的直接回应，也反映了她的心理状态。原文中“abrupt”原义是突然且通常令人不愉快(Collins Dictionary, 2018: 4)，用以形容此时德贝汉小姐此时的不耐烦、焦躁的心情。宋兆霖和

镕榕的译文“有点儿粗暴”中“粗暴”意思为“鲁莽、暴躁”（现代汉语词典，2016：220），情感强度超过了简单的不满、不耐烦，与整本书中塑造的德贝汉小姐沉着冷静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Brown和Levinson（1987）的礼貌理论，人们希望自我形象被社会所认可，而德贝汉小姐的手势表达了一种不太符合社交礼貌的直接性，此处的“粗暴”与该角色惯常形象产生反差，这在宋兆霖和镕榕的翻译中得到了强调，不仅增强了原文的情感色彩，也更加贴近人物的心理状态。这种翻译也符合Verschuieren（1999：59-61）对语言协商性即语言与语境相关的要求，有效地增强了情感表达的直接性和紧迫感，更加直观地将她的不安传递给读者，使读者与其达到共情。相比之下，陈尧光的“不耐烦”和郑桥的“不太淑女”虽然也传达出她的不悦与焦虑情绪，但是在突出德贝汉小姐情感的直接性和强烈程度方面略显不足，也不利于为读者刻画一个立体的人物形象。

例4：

原文：“How was it, since you were nervous of this man Ratchett, that you hadn't already bolted the door between the compartments?”

“I had,” **returned** Mrs. Hubbard **promptly**. (Agatha, 2015: 101-102)

宋译：“既然你怕这个雷切特，怎么事先不把那扇两个房间相通的门闩上呢，这是怎么回事？”

“我是闩上的。”哈伯德太太当即**反驳**。（宋兆霖、镕榕，1979：101）

陈译：“既然您对雷切特这个人不大放心、您怎么没想到要把隔门闩上呢？”

“我闩了，”赫伯德太太立刻**回答**。（陈尧光，2006：94）

郑译：“既然你这么害怕这个雷切特，为什么不把两个房间之间的联通门闩上呢？”

“我闩上了。”哈巴特太太迅速**答道**。（郑桥，2020：89）

此处的场景是哈巴特太太向波洛描述昨晚一个男人进了其房间的经历，波洛在获取初步信息后，提出一系列问题，对话由此产生。该情节揭示了她的性格特点和心理状态。结合全文，哈巴特太太被塑造为一位喋喋不休的、情感外露的下

层阶级妇女。原文中“return”原义之一是对某人的行动做出同样的行动作为回复，“promptly”意思是迅速做某事（Collins Dictionary, 2018：1289，1196）。这两个词表明哈巴特太太立刻对波洛的话做出反应，这种迅速的回答暗含了抗拒和反驳的内涵。根据Leech（1983）的礼貌原则中的一致准则，人们会减少自己与别人在观点上的不一致，然而在此，处哈巴特太太的回复并不顺应波洛的观点，这种回应展示了哈巴特太太对波洛提问的不满。此处宋兆霖和镕榕的译文“反驳”的意思是“说出自己的理由，来否定别人跟自己不同的理论或意见”（现代汉语词典，2016：360），既表达了回应之意，又增添了否定和对抗的含义，突出了哈巴特太太的情绪态度，同时，对波洛问题的不赞同突出了其态度的强硬程度，使读者看到更有层次感的人物形象。相比之下，陈尧光的“回答”和郑桥的“答道”，虽然准确传达了原文的基本含义，但在揭示哈巴特太太对问题的不满和情感反应上的深度和强度上略显不足，无法使读者体会到原文传递出的角色情感波动，从而阻碍读者对人物形象的解读。

（三）文化适应与情感表达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因此译者应该同时考虑到原语和目标语言文化，从而更准确地理解原文想要表达的意思，用更准确的、更贴合目标语言环境的词汇进行翻译，从而给读者带来更好的阅读体验。

例5：

原文：“You are a **philosopher**, Mademoiselle.” (Agatha, 2015: 42)

宋译：“你是一位镇静自若的**圣人**，小姐。”（宋兆霖、镕榕，1979：41）

陈译：“您是位**哲学家**呢，小姐。”（陈尧光，2006：38）

郑译：“你真像个**哲学家**，小姐。”（郑桥，2020：35）

在此场景中，德贝汉小姐在东方快车因大雪停在轨道上时，相较于其他乘客的焦虑不安，她展现出了冷静和理智的态度。结合语境来看，波洛这句话是对她的沉着态度表示赞赏。这是一个重要的交际行为，展示了波洛对德贝汉小姐个性的评价。原

文的“philosopher”原义之一是深入、严肃思考生活和事情的人（*Collins Dictionary*, 2018: 1123），暗含深思熟虑和沉着冷静之意。根据Hatim和Mason（1990）的语用学翻译理论，翻译应充分考虑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和受众的预期。宋兆霖和榕榕的译文“镇静自若的圣人”中“圣人”意思是“旧时指品格最高尚、智慧最高超的人物”（*现代汉语词典*, 2016: 1174），多出现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形容圣贤一类的人，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圣人”一词代表着最高尚的品格。在此处语境下的意义，已超出了原文“philosopher”一词本身的含义。该译文突出对德贝汉美好品质的称赞，不仅深刻地表达了原文的语境和情感色彩，更为读者带来强烈的文化共鸣和感知体验。相比之下，陈尧光和郑桥的译文“哲学家”虽然忠实于原文的字面意义，但在文化适应和情感增强的效果方面未能充分发挥目标语言文化资源的潜力，不利于读者理解和直观地感受到赞美之意。

例6:

原文: She was speaking now to the restaurant attendant in a clear, **courteous but completely autocratic** tone. (Agatha, 2015: 25)

宋译: 她正用一种清晰、**文雅的，然而十足专横**的语调，在和餐车侍者讲话。（宋兆霖、榕榕，1979: 24）

陈译: 她正在对餐车侍者说话，语调简洁、**客气，然而不容拒绝**。（陈尧光，2006: 23）

郑译: 她正在跟餐车服务员说话，声音清晰、**礼貌，但透着一种专横**。（郑桥，2020: 22）

此处的场景是波洛首次在餐车内仔细观察各位乘客的外貌和言行举止，标志着德拉戈米罗夫公主在文中的首次亮相。公主对待餐车侍者的语气显示了她的高贵气质和权威态度。这个描写不仅关注语言表达，还涉及身份和权力的展现。原文中用了三个词来形容她的语调，其中，“courteous”原意为有礼貌的、懂得尊重的，“autocratic”原意为独裁的（*Collins Dictionary*, 2018: 345, 90），结合全文，德拉戈米罗夫公主身份高贵，此处的两个形容词显示了她既有礼貌又有权权威的特质。宋兆霖和榕榕的译文“文雅的，然而十足专横”中“文雅”意思是“言谈、举止温和有礼貌，不粗俗”（*现代汉语词典*, 2016: 1373），不仅有原文礼貌的意思，

还多了一层“温和大气”的含义，根据何自然和冉永平（2006: 27）对于语用学和翻译的相结合的观点，好的翻译可以使译入语读者结合自身文化联想到原文想要传递出来的效果。“文雅”这个词就经常出现在中国人的语境之中，用以表达一个礼貌大气的形象，该译文可以更好地为读者传递原文的表达效果；“专横”意思是“任意妄为；专断强横”（*现代汉语词典*, 2016: 1373），在强调公主的权威和不可违抗性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根据Gregory和Carroll（1978: 49-50）的“社会决定论”观点，社会结构决定了人能够扮演的角色，而一个人扮演的社会角色决定了其对语言的选择。这里的翻译通过精准而生动的用词，充分展现了原文中的对社会身份的描述和情感强度，使得德拉戈米罗夫公主的形象更为立体。相比之下，陈尧光的“客气，然而不容拒绝”和郑桥的“礼貌，但透着一种专横”虽然也传达出该角色的礼貌与强硬，但在强调其身份和权威性方面稍显不足，无法直观地为中国读者呈现公主高贵、权威的形象。

（四）结论

通过对比研究，笔者发现，1979年出版的宋兆霖和榕榕译本相较于2006年陈尧光译本和2020年郑桥版本译文，在处理情感表达词汇、短语、句子和情感增强效果方面具有优势。这具体体现为：

宋兆霖和榕榕的译本在情感表达方面体现出更高的创造力和细腻性。他们通过精准且丰富的词汇选择，不仅增强了原文的情感色彩，还加深了角色的心理描绘，这对于推理小说中情节的推进和角色之间的情感碰撞起到了关键作用。这种细致的情感渲染策略是理解复杂角色和维系故事紧张度的重要因素。两位译者还展现了对中华文化背景和受众预期的深入理解。他们在翻译过程中结合语境，在选择译文词汇时贴近中华文化，有助于译入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想要表达的情感和意图。这种文化敏感性的体现提高了译文的接受度和文化适应性。

研究发现，考虑到推理小说的特点，情感增强策略对情感细节和角色心理状态的深度挖掘对于故事的情节推进至关重要。通过分析可得，细腻的情感表达与人物形象塑造能够显著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使故事更加扣人心弦。

五、情感增强原因分析

上述结论中提到宋兆霖与榕榕的译本在情感表达处理方面进行了情感增强处理,使情感更细腻、深刻。笔者将在本部分分析其原因。

(一) 译者背景

宋兆霖于1953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外语系后便于浙江大学任教,后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还曾担任多年浙江省翻译协会主席。

宋兆霖的翻译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50—60年代,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左右及之后。第一个时期是新中国刚成立之后,中国的西方文学发展处于起步阶段,这个时期宋兆霖的翻译多偏向介绍西方文化;第二个时期处于“文革”之后,当时的中国涌入大量西方作品,宋兆霖也根据时代需求选择了更多有深意,可以为社会带来启示的作品(邓丽云,2014:6-7)。《东方快车谋杀案》便属于第二个时期,同属于第二个时期的还有《简·爱》《呼啸山庄》《双城记》《大卫·科波菲尔》等著名文学著作。

宋兆霖选取翻译材料强调其艺术性、社会性和教育性,他曾提到阿加莎的作品对于社会当中的问题有所反映,涉及许多方面如暴力、不公、贪婪、资本主义的邪恶等(邓丽云,2014:42-43)。如《东方快车谋杀案》中,反面人物雷切特利用金钱与不正当手段逍遥于法律之外,反映了她对资本主义的腐朽、社会的不公的批判;而主人公波洛在推断出整个案件过程之后,并没有对任何一个人采取进一步措施,也体现出了人文主义关怀。

这些第二时期的作品都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都具有语言的艺术性以及主题的深度,对于人物的描写都更注重其内核而不只是表象。广泛接触这些文学作品使宋兆霖在注重翻译原作风格的同时,更加注重情感表达,更加注重译文词汇的选择,以达到生动、传神的效果。

(二) 译者其他译作

宋兆霖在其他译著当中也采取了更加生动的词汇表达情感。如在《简·爱》中,他使用了程度副词“简直”来增强语气、使用更加准确生动的动词“扑”来体现角色当下的状态、使用音译使译文更加具有文学性(辛楠、鲍志坤,2019)。再如在

《呼啸山庄》中,宋兆霖使用更加口语的表达更好地传达出主人公的情绪(陈丹蕾,2017)。所以注重情感表达是宋兆霖在翻译过程中的个人风格。

综上所述,宋兆霖的翻译经历、对待作品的态度以及其翻译风格都是其注重情感增强的原因。

六、结论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对中国及全球文学有着重要影响,对其作品的研究也涉及诸多学科。本文的创新点在于通过语用学视角对《东方快车谋杀案》三个不同的中文译本进行了深入分析,解析了译者在情感表达词汇等方面的翻译方法,从而解码其情感表达翻译策略,并分析情感增强的原因。

从理论层面看,本文将语用学与翻译研究相结合,开创性地将语用学用于推理小说的译文分析中,不仅拓宽了翻译学的理论框架,而且扩大了语用学的适用范围。本文通过解读语境、分析不同译文在语境中的情感表达效果,从而探索最佳的情感增强表达方式。这有助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情感表达的深刻理解和细节化处理。由于推理小说属于文学范畴,本文将语用学应用于文学作品翻译,并探讨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对情感细节的不同表达,帮助译者更好地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也为翻译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译者不应仅限于了解词汇、语句、段落等语言层面的知识,而应该具备更加全面的能力,包括对原文情感、语境的深入理解;掌握多种理论和原则,例如通过礼貌原则深度了解人物的心理状态和社交意图,从而对人物的情感、反应等细节翻译更加准确;译者还需要对原文与译入语文化深入理解,在正确传达原文中的情感的同时也选取更加贴合译入语文化的词汇、短语进行翻译。

综上所述,本文旨在为未来的翻译研究和语用学研究提供案例,为进行情感表达相关翻译的译者提供思路,帮助译者处理细腻情感表达、提高翻译质量,从而为读者提供更丰富、更有深度、更有层次的译文。

参考文献

- [1] Agatha, Christie. 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 [M].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15.

- [2] Brown P, Levinson S C.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3] Collins COBUIL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M].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18.
- [4] Gregory M, Carroll S. Language and Situation: Language Varietie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s [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 [5] Hatim B, Mason I. Discourse and Translation [M]. London: Longman, 1990.
- [6] Hatim B, Mason I. 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 [7] Morris C W. 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8.
- [8] 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9.
- [9] 阿加莎·克里斯蒂. 东方快车谋杀案 [M]. 陈尧光,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 [10] 阿加莎·克里斯蒂. 东方快车谋杀案 [M]. 宋兆霖, 镕榕,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79.
- [11] 阿加莎·克里斯蒂. 东方快车谋杀案 [M]. 郑桥, 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20.
- [12] 陈丹蕾. 从奈达功能对等理论视角对比分析《呼啸山庄》两种中译本人物语言翻译 [D].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2017.
- [13] 邓丽云. 宋兆霖翻译实践活动研究 [D].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2018.
- [14] 郭旋. 《东方快车谋杀案》原著与电影的对比 [J]. 电影文学, 2018 (14): 91-93.
- [15] 何自然, 冉永平. 语用学概论 [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6.
- [16] 黄立鹤. 多模态语用学视域下的言语行为与情感因素: 兼论在老年语言学中的应用 [J]. 当代修辞学, 2019 (6): 42-52.
- [17] 胡岚. 语用学理论视域下的英汉翻译探析 [J]. 名作欣赏, 2022 (21): 162-164.
- [18] 胡壮麟. 语言学导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 [19] 现代汉语词典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 [20] 邢福义, 吴振国. 语言学概论 [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 [21] 辛楠, 鲍志坤. 评宋兆霖翻译风格与策略——以《简·爱》译本为例 [J]. 英语广场, 2019 (8): 23-25.
- [22] 杨赛雅. 语用学视域下电商主播的话语策略研究 [D]. 开封: 河南大学, 2023.
- [23] 张永伟, 顾曰国. 基于大规模语料库的情感与修辞互动研究 [J]. 当代修辞学, 2018 (3): 38-54.
- [24] 张宇. 语言学视角下的国内外情感研究现状与趋势分析 (2011—2020) [J]. 外国语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2, 45 (1): 67-78.

Translation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An Analysis of Emotio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 from a Pragmatic Perspective

Cui Yuqi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emotional expression in the thre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Agatha Christie's *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 (1934) from a pragmatic perspective. Emotional expression depicts the emotions of both characters and the author. It significantly impacts character portrayal and story development, helping readers better understand the novel. However, a research gap still exists on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regarding emotional expressions of this novel. Drawing on the context and politeness strateg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three Chinese translations by Song Zhaolin and Rong Rong (1979), Chen Yaoguang (2006), and Zheng Qiao (2020), revealing how different translators translate the emotional effects through words. It is indicated that Song Zhaolin and Rong Rong's translation is more accurate and rich in details, with a more nuanced handling of context, which is related to his translation experience and habits. The research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improvement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quality by reminding translators to use pragmatic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original work and translate it in more detail.

Key words: *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 Pragmatics; Emotional expression; Emotional enhancement; Translation strategies